

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新变

高长山 骆 洋

摘要：蔡邕对《礼记·月令》的解读，体现了不同于汉代经师儒生的一些新特点、一些新变化，表现出消解儒学束缚的新思想，以及重自然、轻名教的倾向。表明蔡邕是汉末涌动的新思潮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声。

关键词：蔡邕；《月令》；新变

中图分类号：K8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5-0081-05

汉末文坛领袖蔡邕算不上经学大家，他流传至今世的论著中，治经学的篇目更是少之又少。但是，从《后汉书》本传记载他在东观组织勘刻熹平石经的始末，就不难看出他对经学的重视。在蔡邕现存的经学著作中，他对礼学，尤其是《礼记·月令》关注最多。蔡邕对《礼记·月令》的解读也受到了汉末经学“改革”风气的影响，但是作为一位学者来解读儒家经典，其角度和经学家的解读出现了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恰与魏晋玄学又有很多相似。所以，讨论蔡邕礼学解读思想的新变与汉晋间文化思潮转型，可以以郑玄的礼学思想来观照蔡邕对《礼记·月令》的解读，揭示蔡邕礼学思想的新变，由此了解汉晋之际学术思潮及风气的变化。

“月令”一词的概念有广、狭之分，广义上说，它是指上古及秦汉间由国家颁布的关于按照一年十二个月时令进行祭祀、农事以及行政的指导性纲领。它按照春夏秋冬四时的顺序，将一年十二月每个月的气候、天文和主宰神做了系统的讲解。天子要根据四时节令发布号令，带领民众进行祭祀、农耕，并以此决断各项事务。如果政令不符合当下的时节，那么上天就会降下灾祸。《汉书·高帝纪》及《成帝纪》颜师古注引李奇说：“时政，月令也。”《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时令谓月令也。”可见，“月令”是古代遵循时令、物候而施政的专门术语。从夏周时候开始“月令”就有了文字记载。秦汉以来的“月

令”多尊崇周代的月令，并且也根据实际情况丰富了月令的内容。在以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月令一直在指导着君主实施各项政策。月令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它在我国古代决定农事活动时起到了非常独特而又实用的作用。

从狭义上说，“月令”是指专门记载“月令”内容的书籍《月令》。《逸周书》里就有《月令》篇名的内容。宋代的《崇文总目》著录了《周书月令》，是《逸周书·月令》篇的单行本，已散佚。小戴《礼记》里的《月令》篇也是以“月令”直接命名的。东汉的崔寔著有《四民月令》，明代的戴羲著有《养余月令》。足见“月令”是一个在封建社会一直延续的思想体系，同时它作为记录月令思想的书籍名称也一直在沿用。从“月令”的功能来看，它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时间，并逐步完善。最早的关于“月令”时政的专篇有大戴《礼记·夏小正》、《管子·四时》、《吕氏春秋·十二月纪》首篇、《淮南子·时则训》、小戴《礼记·月令》等。

《礼记·月令》（以下简称《月令》）的内容较比《夏小正》系统完整得多。《月令》更注重“令”，书中有非常具体的制历制度和原则性规定。每一个月的内容都是从天象、气候、物候、祭祀、农事、王事等几方面来撰写的，十分规整。

第一，《月令》对天象的观察非常系统。不仅有星象的记录，还有对太阳位置的记载，以仲春为例：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根据天象，《月令》给春夏秋冬四季确定了节气，如立春、日夜分（春分）、立夏、日长至（夏至）、立秋、白露降（白露）、日夜分（秋

收稿日期：2009-02-08

作者简介：高长山（1963—），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骆洋（1985—），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分)、霜始降(霜降)、立冬、日短至(冬至)……。

第二,按照各个月物候的不同《月令》安排的不同的农事活动。农事上仍然以桑为主。但是国家对农事的管理大大增强了,许多农事劳作都是国家强制执行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到了按照自然规律来调节生产。天子和农事结合的内容是《月令》比《夏小正》完整的部分。每个季节,天子会亲躬示范劳作,以祈求丰收。例如孟春时候“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除了养桑生产以外,《月令》还特别注重畜牧业、渔业的发展。仲夏时候就需要“游牝别群”。

第三,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为一体的王事活动。《月令》里规定的王事政令都以时令为基础。太史令观测天象,掌握天象的运行法则,指定历法标准,告知天子何时进行相关的王事活动。例如孟秋时候,“命有司修法制,缮图圉,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根据天象物候,天子还要祭祀上天,不同的时节,祭祀也是不同。祭祀和历法集合起来,按时迎接春夏秋冬,以祈祷风调雨顺。此外,王事政令里还强制规定不许在春天砍伐森林、猎捕幼畜、一切以农事为主,不得在农忙时兴兵役……,等等。

第四,强调《月令》的不可更改性。《月令》要求人们按时节行令,按气象自然从事生产,否则就不会受到上天的保佑,以致遭受灾祸。所以每一个月的时令最后都会写道违反时令将会遭到的苦难。仲秋时候,如果不行仲秋月令,则是“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值得注意的是,《月令》里天象和五行是统一的。五方、五音、五色、五味等都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礼记·月令》因其完整、规范的时政记录符合历代帝王君主的统治而被广泛采用。在汉代以经学为主的文化氛围里,《礼记·月令》也是众多治经者的研究重点。对《礼记·月令》,蔡邕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一、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特点

由于今文经学重师传,多是口头传授,没有文字可依,老师所说的就是正确的道理,违背老师就不能做博士弟子。这样的学问发展下去只是越来越

繁琐,言不达意。但无论如何,今文经学是被承认的官学。而在民间,另外一种经学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古文经学。它把儒家经典视为上古的历史材料,提倡家法,厚古薄今,把古代社会和制度理想化。对经文的文字、名物等进行解释。由于治学的方式不同,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以致于“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何休注《公羊传》,亦不引《周礼》一字,许慎《五经异义》,分今文说、古文说甚晰。”一直以来古文经和今文经都相互对立,各有所争,使学者无所适从。经学发展到汉末,出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从马融开始,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了相互趋同。马融注经以古文为主,同时还采纳了今文经里合理的部分。这样既使古文经更加成熟,同时也让经学学派开始融合。郑玄是马融的弟子,他吸取了老师的经学观点,在古、今文经学的比较中进行鉴别,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经学体系。

蔡邕与郑玄是同时代的人,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蔡邕对经学也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对礼学更是偏爱。因为他认为礼的制度是国家的根本。“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祇奉也。”^①

蔡邕传世的解经论著不多,其对《礼记·月令》的解读是经学方面唯一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记载蔡邕曾撰写《明堂月令章句》12卷,而两《唐书》缺载,清人余萧客、陆尧春、蔡云等各有辑本。现在尚存的《月令篇名》、《月令问答》以及《明堂论》是比较完整的篇目。从这些残篇里,依然可以明晰蔡邕儒家经典解读的一些特点。

首先,蔡邕对《月令》传抄时导致字句的错误进行了订正。这些细小之处的订正在蔡邕之前没有关注,同时这些订正关系到“礼”对天子及天子宫室等是否符合标准的判定。现试举两例说明:

问者曰:“《仲冬令》曰:‘奄尹申宫令,谨门闾。’今曰门闾,何也?”曰:“阍尹者,内官也,主宫室。出入宫中之门曰闾,阍尹之职也。闾,里门,非阍尹所主,知当作闾也。”^②

在这一条问答中,涉及的问题是皇家仆人司职的问题。阍尹只能在皇宫里门闾之间工作,不能跨入到其他地方。所以《月令》中所说的管理门闾就是字

^① 清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64页。

句上的误传。这样的解释不但把字句改正，使文章更加接近原文，而且也明确了皇宫内职官的任务，符合“礼”的规范。

问者曰：“《令》曰‘七驂咸驾’，今曰六驂，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驂，故知六驂。《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驂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①

天子的座驾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以显示皇家的威严。破坏了这个规范对上天是不敬的，这里更改了马匹的数目以求符合“礼”制。

其次，蔡邕对《月令》中的名物进行了考证。蔡邕考察的名物包括祭祀的牺牲、明堂、乐器……现以明堂为例。在古代天子颁布月令的地方在明堂，所以明堂就成为了天子发布政令的地方。明堂自上古就已经有了建制，只是随着发展历史，明堂的模式建制等出现了不符合礼制规范的地方。蔡邕翻阅古籍、博采众家，考证了明堂的源流。在考证明堂源流的时候，他认为：“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②还通过引用《易经》来说明“明堂”名称的来源。“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乡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③此外，蔡邕还广泛征引《乐记》、《尔雅》、《诗经》等来明确明堂与月令的关系。

从现在可窥见的蔡邕解读经典的特点来看，蔡邕以非经学家视角的解读，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恰是汉晋间思潮转型的征兆。

二、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新变

蔡邕解读《礼记·月令》的新变，主要体现在与汉末主流经学家郑玄的解读思想不相一致，对儒家思想有消解倾向，以及由解读而体现的对“自然”的体认等方面。

1. 以“博通”为核心

郑玄在对《三礼》进行注释的时候，如有古制可循，则一定会依古制。因为儒家一直认为周代古制是最适合社会统治需要的。孔子就曾感叹：“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④

但是，蔡邕却并非认为古制都是可以依傍的。在《月令问答》里有这样几则：^⑤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抵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也《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问者曰：“既用古文于历数，不用《三统》，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参诸，非一家之事，传之于世，不晓学者，宜以当时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统》已疏阔废弛，故不用也。”

问者曰：“既不用《三统》，以惊蛰为孟春，中雨水为二月节，皆《三统》法也，独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则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蔡邕认为《月令》是与《左传》同时代的周代典籍。这以古文经学家的视角来看则应该以古制为依据，对其进行注释。但是蔡邕没有刻板地遵循古文经的家法。《三统历》是根据汉初《太初历》制定的。《后汉书·律历志中》：“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王先谦集解引清钱大昕：“三统与太初异名而同实。刘子歆用太初法推衍之以说《尚书》、《春秋》，又追日月五星同起牵牛之始，以为太极、上元，初非别立一术，则三统之名不自歆始也。”《三统历》实际上是上古就开始使用的历法，汉代的刘歆把它系统化了。《四分历》从东汉时开始使用，是编欣、李梵等创制。从数据测算上看，《四分历》已经比《三统历》精确很多，《后汉书·律历志中》：“四分历本起图谶，最得其正。”

蔡邕认为《月令》“体大经问”并不是一种历法可以解释全面的，对《月令》的注释需要全面考察，《四分》比《三统》精确，虽然不是古制，但更适合《月令》的实际内容。但是《三统》里能够解释《月令》的部分蔡邕还是采纳的。同时，在采用《四分》和《三统》之外，蔡邕还注重实际的天象情况来解释《月令》物候，其云：“今不以历节言，据时始暑而记也。历于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则小暑当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节言，据时暑也。”

^① 清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

书局，1987年，第901-902页。注：本节所引《月令问答》均摘自注释①所属书籍。

从这一点看，蔡邕的解读更加注重“博”与“通”。这和魏晋学人的治学方式有些相通的地方。《魏书》记载：“（温）子升初受学于崔灵恩、刘兰，精勤，以夜继昼，昼夜不倦，长乃博览百家，文章清婉。”《晋书》：“（嵇康）学不受师，博览无不该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郭）太尉王衍每云：‘听（郭）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魏晋以后的文士注重阅读的广泛，博采各家专长。

2. 变“崇”儒为消解

蔡邕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对儒学也会产生疑惑，由此而出现消解儒学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确实又构成了蔡邕经学解读的新变。

问者曰：“《令》以中秋筑城郭，于经传为非其时。《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营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传曰‘小昏正而栽筑’，即营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筑也，栽木而始筑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于经传也。”[案：此条阙答语。]

《诗经》从先秦开始就是儒士学者研习的经典，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合纵连横频仍，其间的外交辞令多引《诗经》，这就是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里记载晋公子重耳与秦王会面时的场景：“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河水》是《诗经·小雅》的篇目，原意是小河的水最终汇入大海，重耳引申为将来会归顺秦国。

《六月》也出自《诗经·小雅》，内容原是贤臣尹吉甫辅佐帝王征伐，秦王引申为重耳会像尹吉甫一样成功。在《论语》里，孔子的弟子也经常讨论《诗经》。“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①孔子对《诗经》评价也很高，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诗经》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③汉代奉六经，开经学博士的顺序也是以《诗经》为首。汉儒对这部经典尊崇有加，行为准则以《诗经》为标准。

蔡邕在解读《月令》的时候却没有遵照这一经典的解说。《诗经》认为九十日是修筑房屋的时间，蔡邕在解读《月令》时认为八月才是修筑房屋的最佳时间。虽然这条问答没有答语，无法知晓蔡邕的道理是什么。但是不以《诗经》来改正《月令》的

“错误”，而坚持实际天象物候对修筑房屋的影响，这实际是在消解儒家经典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问者曰：“子说三难，皆以日行为本。《古论》《周官》《礼记》说，以为但逐恶而已，独安所取之？”曰：“取之于《月令》而已。四时通等而夏无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阴，秋行少阳，冬行太阴，阴阳背使不于其类，故冬春难以助阳，秋难以达阴。至夏节太阳行太阴，自得其类，无所扶助，独不难取之于是也。”

《古论》、《周官》、《礼记》都是儒家记载礼制的典籍。蔡邕注释《月令》却没有依照古礼，因为他认为《月令》“不宜与记书杂录并行而记家记之……非其本旨。”不遵循古礼所记载的，以《月令》为尊，从儒家的角度看是越礼的行为。“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④《论语》里讲到“礼”的地方有75次，这其中以讲君子修为的“礼”占主要，天子礼制的部分很少。孔子认为天人关系应该是“不以礼为核心，而以仁为核心。”^⑤《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有：“《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左传》也认为，《诗》和《书》是儒士要先行修习的。儒家讲究以礼调和人们的关系，蔡邕这种对儒家礼制的挑战以隐于儒家经典之中来阐释《月令》，无疑对魏晋后学是一种启发。

魏晋玄学继汉代经学而起，它不同于经学的特色，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但是从玄学发展的过程看，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以道换儒，而是要援道入儒，以达到儒道融合的目的。玄学家依然尊崇孔子为“圣人”，老庄是“太贤”。如何调和两者的对立关系呢？“他们的办法是，先从道家思想里提炼出‘以无为为本，以有为为末’的精华，作为玄学家的根本指导思想。”^⑥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对所处时代的名教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提出了自己“崇本以息末”的观点。他认为名教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不能因为名教而名教，如果只是以名治名，那么就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如何去掉这一弊端，王弼提出了回归名教的本源“朴”。“朴”即“道”。老子也强调过“朴”的意义。这又回归到了道家的核心之中。王弼的结论是：“名教”出于“自然”。自然即朴即道。他的结论旨在为“名教”寻找本源，以此消解儒学对人性的控制。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蔡邕曾经当着满室高朋推举王粲，并说：“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记载：“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

① ②③④⑤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9、11、30、81、16页。

⑥ 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学术论文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谋反，桀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叶。”王叶是王弼的父亲。完全可以推断，蔡邕的藏书沾溉了玄学家王弼。汉末从蔡邕开始的消解儒学的思想和作为，在魏晋之初开始盛行，王弼也许就是从祖辈那里得到了灵感，才把这种思想融汇到玄学中去的。

3. 辨证看待自然与王政

针对郑玄和蔡邕对《月令》同一句子的注释来看，蔡邕更注重对自然的介绍。现试举一例。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①

郑注：又记时候。

蔡注：季冬，雷在地下。则雉应而雊；孟春动于地上，则蛰虫应而振出。至此月而升于天之下，其气发扬也。以雷出有斩，故言乃。

蝼蛄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②

郑注：皆记时候也。蝼蛄，鼃也，王瓜，葇荳也。

蔡注：蝼，蝼蛄。蛄，蝦蟆也。

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鼃，祭先肺。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③

郑注：皆记时候也，鹰学习，谓搏攫也。

蔡注：鸱化为鹰，鹰还化为鸱，故曰化。

今腐草为萤，萤不復为腐草，故不称化。

以上三句反映的是《月令》中记载物候的内容。从郑玄和蔡邕的注释可以看到，郑玄对物候的记载没有展开，认为这只是对当月自然现象的记录。蔡邕则更为深入把这种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详细地加以解释，并且打破月令时间上的限制，注意“博”取，从根本开始注释。以第一条为例，蔡邕对自然界的雷声、蛰虫如何在孟春开始活动的自然形成过程给予了解释。尤其是第三条，蔡邕对自然界“化”进行了推衍，与庄子的“鲲化为鹏”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对自然注释的深入态度上看，蔡邕在解释儒家经典的时候流露出对“自然”的尊敬与关注。虽然他没有提出“自然”和“名教”的概念，也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但是，他在解释儒家著作时近自然的倾向，已经为后来的魏晋玄学作了榜样。

《月令》本身包含了政令依据天时、自然制定的思想。但传统的经学家都会以经典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来注释经典。以郑玄为例，他是忠君思想的拥

护者。他在给《论语·为政》做注释的时候说：“见义，谓见君有危难，当致身授命以救君，是见义而为，故勇、义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义而勇”。所以，郑玄特别强调维护大汉天子的利益和地位。在为《易》做注的时候，他说：“山在地上，泽在地下，泽以自损增山之高也，犹诸侯损其国之富，以贡献于天子，故谓之损也。”自然物候也好，乾坤卦象也好，儒家都是把天子摆在最高地位上，天地万物都是受天子驱使。

蔡邕注释经典时，考虑了自然的因素。“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行王政也。”^④天子施政是以自然为前提的，由此才可以风调雨顺。在这里，自然是不受天子控制的，蔡邕把天子置于了自然之下，这是对“自然”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人类社会之初自然就是在人上的。“《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立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⑤虽然蔡邕还没有给“自然”赋予更多的意义内涵，但是对天子地位的重新审视，把自然放在大于一切的位置上，对儒学又是一次思想挑战。

经学是汉代的特色，可以视为汉代的哲学思想，是汉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蔡邕对儒家经典的解读不同于汉代的经生，而其中蕴含的“前卫”思想则对后世哲学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汉晋间文化转型的一个支点。

本论文为东北师大十一五社科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与文学的演进”项目成果。

An Analysis of New Decipherment of Month-recording in the Book of Rites by Cai Yong GAO Chang-shan LUO Yang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The Comprehending of *Month-recording* in the *Book of Rites* by Cai Yong, embodying some new changes and Features unlike Confucian scholars of the Han Dynasty, shows new ideas dispelling the chain of Confucianism and Inclination of thinking highly of spontaneousness and despising formality. These show that Cai Yong is one of representatives of new trend in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Cai's ideology and activities are the first signs of metaphysic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Keywords: Cai Yong; *Month-recording* in the *Book of Rites*; New Comprehending

① ②③清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25、441、448页。

④ ⑤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903页。

(责任编辑：石磊)